

知识翻译学研究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 AI 翻译的本体重构与不确定性协商 ——基于西蒙顿技术哲学的理论观照

潘艳艳¹ 王晶²

(1. 江苏警官学院 国家安全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1; 2. 南京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翻译的存在方式。然而,既有研究或沉溺于技术决定论的焦虑,或固守技术工具论的乐观,鲜能从技术物本体论高度系统审视 AI 翻译带来的范式革命。本文以西蒙顿《技术物的存在模式》为理论基石,从知识翻译学“技术之维”的“四柱”——技术物的个体化、人机组合的调节机制、不确定性的本体地位、技术的文化嵌入性出发,系统考察 AI 时代翻译主体、客体、主客体关系的三重重构。研究发现:翻译主体正经历从抽象到具体的个体化进程,人类译者与 AI 系统形成深度耦合的“组合—调节”关系;翻译客体从静态文本扩展为动态技术生态复合体,质量标准从“忠实对等”转向“技术适配”;不确定性则从翻译实践的困境升格为主体彰显价值的核心场域。研究结论指向翻译理论的范式转换:从追问“如何译得对”转向探究“如何在人机协商的不确定性中重建意义”。

关键词:知识翻译学;技术之维;西蒙顿技术哲学;本体重构;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6)05-0159-12

DOI:10.26922/j.cnki.waiguoyuwen.2026.05.012

0 引言

近年来,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 AI 技术引发全球范围的认知革命。在翻译领域,ChatGPT、DeepL、Gemini、DeepSeek、豆包、Mini Max 等系统展现出逼近甚至局部超越人类译者的能力。面对这一技术浪潮,翻译研究界的反应呈现出两极分化:一端是技术决定论的焦虑,即机器终将取代人类译者;另一端是技术工具论的乐观,即 AI 不过是更高效的工具,翻译的本质未曾改变。这两种立场都将 AI 翻译系统视为“工具”,而非具有独立存

基金项目:2024年北京东方正龙教学技术有限公司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涉外警务应急语言能力培养的模拟训练环境建设和研究”(240800960214020)、江苏省第六期“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2022)3-16-524]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潘艳艳,女,江苏警官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翻译研究、认知语言学和模态话语分析研究。

王晶,女,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跨文化交际、二语习得和英语教学法研究。

引用格式:潘艳艳,王晶.知识翻译学视域下 AI 翻译的本体重构与不确定性协商——基于西蒙顿技术哲学的理论关照[J].外国语文,2026(5):159-170.



本刊微信公众号

在模式的“技术物(technical objects)”。 “工具观”导致我们无法真正理解 AI 时代翻译发生的变化——不是量的积累(更快、更便宜),而是质的重构(谁在译、译什么、如何译、为何译)。翻译学的知识属性体现为发展性与动态性,要求学科持续回应全球化与技术变革(胡作友等,2026:144)。然而,知识翻译学(Transknowletology)研究多侧重知识的主体间性与文化属性,对技术之维的理论深耕尚显不足。因此,知识翻译学必须正面回答:AI 翻译与人类翻译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如果机器可以完成大部分语言转换工作,人类译者的不可替代性究竟何在(杨枫,2026:2)?要回应这些本体论层面的追问,阐述知识翻译学的技术之维,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视角,能够同时承认技术物的自主性、揭示人机关系的深层结构并将不确定性从“问题”重新定义为“价值场域”。

本文引入西蒙顿代表作《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1980)中阐发的技术哲学,为知识翻译学的技术之维提供坚实的理论根基。西蒙顿(Simondon, 2017:11-16)的核心洞见在于,技术物不是被动的工具,而是具备独立存在模式的“存在者”;必须将技术重新整合进文化中,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让人不仅会使用技术,也参与技术的发明与重构,从而克服人与机器的对立。基于西蒙顿的技术哲学,本文采用“主体—客体—主客体关系”三维分析框架,以《易经》英译的 AI 辅助实践与 TikTok 多语言视频字幕生成为例,从技术之维的四柱出发,揭示 AI 翻译的本体论变化。首先考察翻译主体的个体化进程与人机组合的调节机制,然后分析翻译客体的扩展与不确定性维度的凸显,接着探讨主客体关系从“使用”到“组合—调节”的转型,最后总结翻译学理论范式转换的方向。

1 西蒙顿的哲学内核和知识翻译学的技术之维

在西蒙顿之前,哲学(尤其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往往将技术对象视为“现成在手”(ready-to-hand)的工具,或者是与“诗意栖居”相对立的“座架”(enframing,海德格尔语)。西蒙顿(Simondon, 2017:20-23)则在其代表作《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中对技术哲学进行了“修正”——他不再把技术仅仅看作静态的客体,而是看作一个处于具体化(Concretization)过程中、具有“准主体性”的技术个体。他提出“技术存在”(Technical Being),认为技术不仅仅是具体的机器,而是作为一种存在论范畴的显现,是技术物(Technical Objects),有其自身的进化逻辑(从抽象机器到具体机器)、信息结构和个体化过程。在现代社会,技术往往被隔离在“工程”或“应用科学”的角落,与人文、艺术、哲学(“文化”)脱节。这种割裂导致了“技术异化”——人只使用技术但不理解技术,从而被技术背后的资本或系统逻辑所奴役。西蒙顿希望通过新的哲学视角,将技术重新整合进人类的总体文化中,让技术不仅被使用,也被反思和被赋予意义。

知识翻译学将翻译视为跨语言知识迁移与重构的过程(杨枫,2021:1),其理论体系由“五梁十二柱”构成,“五梁”指翻译的存在之维、过程之维、脉络之维、价值之维、技术之维;“十二柱”是五梁在具体分析层面上的“操作化”,具体包括话语构型、文化资本与符号权力、具身认知、旅行理论、创造性转化、译者立场性、跨地方性生态、媒介间性效应、技术个体化、人机组合机制、不确定性边缘、技术文化嵌入性(杨枫,2026:2-4)。作为五梁之一的“技术之维”,聚焦翻译技术物的存在模式与翻译实践的技性特质。基于西蒙顿的哲学内核,知识翻译学的“技术之维”主要体现为以下四柱(四条核心命题):

第一,技术物的个体化。技术物的个体化程度是衡量其自主性与成熟度的核心指标。从早期的电子词典(高度抽象)到统计机器翻译(中度具体)再到当代大语言模型(高度具体),翻译技术物正经历深刻的个体化进程。个体化程度越高,技术物的“准主体性”越强,对人类行为的调节能力越显著。

第二,人机组合的调节机制。西蒙顿(Simondon,2017:156)提出,人与技术物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使用与被使用”,而是构成一个“组合”(ensemble),其中人与物相互调节、共同进化。在翻译语境中,这意味着译者与 AI 系统的关系升级为深度耦合的“组合—调节”关系,换言之,AI 不再是被动的工具,而是积极塑造翻译过程与结果的“行动者”。

第三,不确定性的本体地位。西蒙顿(Simondon,2017:203)指出,技术物的运作永远包含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是技术失败的标志,而是技术物与人类环境交互的必然产物。由此,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技术的不确定性不是需要消除的缺陷,恰恰是人类译者发挥独特价值的核心场域。在确定性问题上,AI 远超人类;在不确定性边缘,如文化隐喻、语用意图、风格创造等,人类智慧无可替代。

第四,技术物的文化嵌入性。西蒙顿(Simondon,2017:211)强调,任何技术物都不是中立的,它内嵌着特定的文化语境、价值预设与权力结构。翻译技术物尤其如此,AI 翻译系统的训练数据、算法架构、评估指标,无不折射出特定语言文化的霸权地位与价值取向。

以上四条命题构成知识翻译学技术之维的四柱。接下来本文结合这四柱,系统考察 AI 时代翻译本体论的重构。

2 翻译主体的重构:个体化进程(一柱)与人机组合(二柱)

2.1 技术物个体化视域下翻译主体的演变

西蒙顿的技术个体化理论为理解翻译主体的历史演变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所谓“个体化”(individuation),指技术物从功能单一、模块分立、依赖外部指令的“抽象”状态,进化为功能整合、结构耦合、具备相对自主运作能力的“具体”状态的过程(Simondon,2017:22-26)。将这一概念迁移至翻译领域,我们可以清晰地识别出翻译技术物以及与技术物耦合

的翻译主体的个体化轨迹:

第一阶段:抽象技术物时代(1950—1990)。电子词典、机器翻译原型系统是典型的抽象技术物,功能单一(仅提供词级对应或粗糙的句法转换)、模块分立(词典、语法规则、输出模块相互独立)、高度依赖人类操作(需人工选词、调整语序)。这一时期的翻译主体仍为“单一人类译者”,技术物仅扮演被动工具角色,人机关系是简单的“使用与被使用”。

第二阶段:中度个体化时代(1990—2016)。统计机器翻译与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工具的出现标志着个体化程度的跃升。翻译记忆库、术语库、对齐算法等功能开始整合,系统能够基于既往翻译“学习”。但此时的系统仍高度依赖人工清洗语料、构建术语、译后编辑,人机关系是“分工协作”,机器处理重复性匹配,人类处理创造性转换。

第三阶段:高度个体化时代(2016—)。神经机器翻译(NMT)与大语言模型(LLM)实现了技术物的深度个体化。变换器(Transformer)将注意力机制、上下文建模、多任务学习整合为高度耦合的系统,系统具备相对自主的“理解”与“生成”能力。此时,翻译主体不再是“人类译者+工具”,而是“人机协同体”。AI系统作为具有准主体性的“翻译行动者”,与人类译者构成深度耦合的组合。

这一演变过程揭示了一个根本性变化,即翻译主体的边界模糊了。在传统翻译理论中,“主体”仅指人类译者,技术物是“客体”。但在高度个体化的AI时代,翻译活动由“人—机组合”共同完成,主体性是分布式的、协商性的、涌现性的。正如西蒙顿(Simondon, 2017:89)所言:“当技术物达到高度具体化时,它不再是人类的奴仆,而是人类的伴侣。”

2.2 翻译主体的泛化

技术物个体化带来的一个意外后果,是翻译主体的泛化。高度个体化的AI翻译系统因其易用性(无需专业训练即可操作)与可及性(免费或低成本),降低了翻译门槛,使得不具备专业训练的人能够完成跨语言任务。从西蒙顿的视角看,这一现象可理解为高度具体的翻译技术物“吸纳”了传统上属于人类译者的某些功能(如词汇查询、句法转换、基础术语统一),使得非专业用户无需掌握这些技能也可产出可用的译文。技术物的个体化,在一定程度上“去技能化”了翻译活动,将翻译从“专业行为”转变为“通用行为能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专业译者的消亡。西蒙顿(Simondon, 2017:178)强调,技术物的具体化不是取代人类,而是重新定义人类的价值场域——将人类从技术物擅长的确定性任务中解放出来,转向技术物不擅长的“不确定性边缘(margin of indeterminacy)”工作。

以学术论文摘要翻译为例。一位非英语母语的理工科博士生先用DeepL生成英文初稿(确定性任务——术语统一、句法转换),再用ChatGPT进行润色(指令:“请将这段话改为更正式的表达。”),最后自行核对核心术语。这一流程中,AI完成了翻译的“主体工作”,人类(非专业译者)仅执行编辑与验证。译文质量在实用层面可被国际期刊接收。这

说明,在高度个体化的 AI 翻译时代,“译者”不再是特定职业群体的专属标签,而是任何能够有效调用翻译技术物完成跨语言任务的人。翻译知识的生产从精英走向大众,这是技术个体化的文化后果。

2.3 复合主体的形成

非专业译者的崛起与专业译者的“升维”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高度个体化的 AI 翻译生态中,专业译者的核心价值不再体现于“逐句翻译”(这是 AI 擅长的确定性任务),而体现在三个 AI 难以替代的领域:(1)技术物的配置与调校——构建术语库、清洗训练语料、设定风格约束、设计评估指标;(2)不确定性的识别与协商——识别文化隐喻、语用意图、情感语气中的“不可计算”成分,进行创造性转换;(3)技术物输出的批判性审校——识别并修正 AI 翻译中隐含的偏见、错误和文化不当。这意味着,AI 时代的专业译者不再是“语言转换者”,而是“翻译技术专家+文化策展人+不确定性协商者”的复合主体。这一角色转型是技术个体化的必然要求,即技术物越具体、自主,人类越需要成为能够驾驭、调节、批判其运作的“组合主导者”。

《易经》作为中国思想史上最具诠释开放性的经典,其翻译长期被视为“不可译之译”。理雅各(Legge, 1899)、卫礼贤(Wilhelm, 1950)、蒲乐道(Blofeld, 1965)等译者的版本各具特色,折射出不同的哲学立场与文化视域。然而在 AI 时代,翻译主体的个体化使《易经》的英译可通过“人机协同”模式高效完成。首先,构建术语库——人类译者(精通古汉语与易学哲学的专家)确定 64 卦名的英译策略,如“乾”译为“The Creative”而非“Heaven”,遵循卫礼贤的哲学阐释传统而非字面直译;设定核心概念(阴阳、五行、爻位)的翻译规则;接着用 AI 预翻译——ChatGPT-4 基于上述约束产出各卦的卦辞、爻辞初译;然后是不确定性协商。人类译者在 AI 输出中识别了三个典型问题:爻位关系的空间隐喻(如“乘刚”指阴爻居于阳爻之上)被 AI 直译为“riding upon the firm”,丢失了权力关系的语义负荷;占断辞的语用意图(“吉”“凶”“悔”“吝”)被 AI 统一处理为形容词对“auspicious/disastrous”,忽略了语境中的动态变化(同一“凶”在不同卦中的严重程度不同);最后是人工深度介入,人类译者针对上述不确定性重新编码:将“乘刚”译为“the weak rides upon the strong”,为占断辞设计等级量表(good/favorable/neutral/cautious/disastrous)并根据语境选择性使用。这一过程体现了西蒙顿(Simondon, 2017:150)所说的“人与技术物的调节关系”。

由此可见,在高度个体化的 AI 时代,翻译主体重构的核心特征是:翻译不是人类译者独立完成的“创作”,也不是 AI 独立完成的“计算”,而是“人机组合”在确定性任务与不确定性边缘之间持续协商的结果。人类译者的价值不再体现于“对抗机器”,而体现于“与机器协商”,在 AI 无法处理的不确定性场域,行使不可替代的文化判断与意义创造能力。在高度个体化 AI 时代,“与机器协商”使我们实现了大量翻译任务高效完成的可能。例如中

国外文局旗下中国网(China.org.cn)的“人机协同智能翻译平台”于2023年启动,用于国新办发布会英文实录、双语外传节目及多语种稿件的“AI初翻+人工译后编辑”协同生产^①,为我国外宣服务,及时、快速地进行国际传播。

3 翻译客体的扩展:不确定性作为本体维度(三柱)

3.1 客体形式的多模态化与技术约束的内化

西蒙顿(Simondon, 2017:112)指出,技术物的具体化意味着其运作环境的复杂化。高度具体的技术物不再是孤立的,而是嵌入一个由其他技术物、人类操作者、自然环境构成的网络中。这一思想对理解AI时代翻译客体的变化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传统翻译客体主要是线性的、静态的纯文本(书籍、合同、信函等),其存在模式相对独立。当代AI翻译的客体则呈现三个根本性变化:

第一,形式的多模态扩展。翻译客体涵盖图文混排的界面文本(手机App、网页)、音视频流(需语音识别、字幕生成、配音同步)、即时交互信息(聊天对话、游戏内动态弹幕)以及嵌入图像的OCR文字。翻译客体从一个“文本”变为一个“技术生态复合体”,它同时是语言符号、界面约束(字符宽度、按钮尺寸)、时间约束(字幕时长)、行为逻辑(点击后的页面跳转)的集成。

第二,技术约束的内化。传统翻译以“忠实”和“通顺”为主要质量标准,这两个标准是“语言学内部”的。在AI时代,翻译客体必须额外满足一系列“技术生态”约束,这些约束从边缘条件上升为核心质量标准:字符长度是否适合按钮或文本框(UI适配);译文中的术语是否便于机器后续检索与对齐(机器可读性);将译文再译回原文时关键术语是否可逆(回译一致性);译文是否触发敏感词过滤系统(合规性)。这些约束不是语言学性质的,而是技术生态性质的,翻译客体“合格”与否,在同等程度上取决于它对技术环境的适配程度。

第三,生命周期的时间性重构。传统翻译客体通常是完整的终稿文档,具有封闭性、稳定性和可存档性。AI时代的翻译客体经常是动态生成的片段(实时聊天、用户评论、库存提示)、持续迭代的语料(随对话或版本更新)、未完成的草稿态文本(AI初稿作为需再加工的“中间客体”)。翻译的“终点”消失了,每一次用户反馈都可能触发译文的再修订。

3.2 不确定性的本体地位:从“误差”到“价值场域”

西蒙顿(Simondon, 2017:203)对不确定性的论述极具启发性:“技术物的运作永远包含不确定性……这不是技术物的缺陷,而是技术物向人类环境保持开放的标志。”在西蒙顿看来,完全确定的技术物是封闭、僵化、与生命相对立的;真正“具体”的技术物恰恰因其不确

^① 该平台属于机构内部的工作流平台,不向普通公众开放使用。

定性而能够适应多样化的情境。将这一思想迁移至翻译领域,我们获得一个革命性的认识:AI 翻译系统永远无法彻底消除翻译中的不确定性,比如,语义歧义、语用意图的微妙差异、文化特定概念的可译性限度、风格效果的不可计算性等。这不是 AI 技术不够先进,而是翻译活动本身的“技术性”决定的。翻译始终面临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源文化语境与目标文化语境之间的“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不可能被任何算法彻底消除。

因此,AI 时代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消除不确定性”,而是“如何识别、分类、协商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并在人机分工中合理配置”。知识翻译学的技术之维为此提供了操作化框架。即 AI 能够高效处理“语言系统内部”的确定性歧义(词汇、句法),但在涉及“语言外部”文化语境、语用行为、风格效果时,人类介入的价值急剧上升。这不意味着 AI 永远不会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而是意味着不确定性本身就是翻译活动的构成性特征——即使最先进的 AI 也无法彻底消除它。翻译的本质不是消除不确定性,而是在不确定性中做出“好的”选择,这才是人类译者的价值所在。

我们以 TikTok 多语言视频字幕生成中的不确定性协商为例。TikTok 的自动字幕生成功能为理解翻译客体的复杂性提供了典型场景。例如,用户上传一段中文短视频(如一位重庆博主用方言讲述当地火锅文化),系统需自动生成英文字幕,并在多语言版本中分发。这一任务中的翻译客体呈现出高度复杂性:(1)多模态性——需同时处理音频(方言识别+转标准中文+英译)、视频时间轴(字幕与口型同步)、画面中的文字信息(如店铺招牌 OCR 识别+翻译);(2)技术约束内化——英文字幕需在两秒内显示完毕(平均 ≤ 12 个单词),长句需拆分或重写;禁用词列表中的词汇(如涉及政治敏感内容)需自动替换或模糊化处理;(3)不确定性密集——方言词汇(例如“袍哥文化”在重庆方言中的特定含义)无标准翻译;文化专有项(火锅的九宫格吃法)需加注或意译;语用意图(博主开玩笑说“不吃辣的不是重庆人”)是调侃而非字面判断,需调整语气。

在传统翻译模式中,这类任务需多角色分工(听写员+翻译+字幕员+文化顾问)。在 AI 时代,高度个体化的技术物能够一体化处理大部分确定性任务:语音识别转文字→机器翻译→自动切分时间轴。但不确定性边缘需人类介入:方言特有词汇,系统可能输出直译(如“袍哥”译为“robe brother”)或留空,需人工干预;文化专有项,系统可能过度意译(将“九宫格”译为“nine-grid hotpot”)或过度直译(“nine squares”),需人工判断目标受众的文化熟悉度决定策略;语气识别,系统难以区分“不吃辣的不是重庆人”是威胁、调侃还是身份认同,需人工标记语用标签。

综上,在 AI 时代,翻译客体的本体论重构表现为:客体不再是“等待转换的文本”,而是“需要在技术生态中完成多模态适配与不确定性协商的动态复合体”。翻译的“产品”不是字幕文本本身,而是“文本+时间轴+文化注释+语气标记+技术约束验证”的集成包。客

体的边界模糊了,它同时是语言制品、技术制品、文化制品的混融体。

4 主客体关系的转型:从使用到组合—调节

4.1 西蒙顿“组合”概念的理论内核

西蒙顿(Simondon,2017:156)在论述人与技术物的关系时,提出了一个极具原创性的概念——“组合”(ensemble)。“组合”区别于简单的“使用”,后者预设人是主体、物是客体,关系是单向的、工具性的。而“组合”预设人与物共同构成一个运作单元,二者相互调节、共同适应、协同进化。

西蒙顿(Simondon,2017:130-140)以音乐家与其乐器为例阐明这一概念。一位优秀的小提琴家与其乐器不是“使用者—工具”关系,而是“组合”关系:小提琴的木质、琴弦张力、共鸣特性塑造着演奏者的触弦方式与运弓力度,而演奏者的技法进化又会反向“训练”乐器(通过调整琴马、更换琴弦)。在这一组合中,边界是模糊的——音乐不是“人演奏乐器”的结果,而是“人—琴组合”涌现的产物。将这一思想迁移至翻译领域,我们获得理解 AI 时代人机关系的全新视角:人类译者与高度个体化的 AI 翻译系统不是“使用”关系,而是“组合—调节”关系。AI 系统的架构、训练数据、输出特性塑造着译者的工作方式与决策模式(如译者的修改习惯会适应 AI 的典型错误类型),而译者的每次修改与反馈又反向“调节”AI 系统(通过强化学习微调、术语库更新、记忆库积累),使其逐步优化。

4.2 翻译主体——客体关系的四重转型

基于西蒙顿的组合理论,我们可以识别出 AI 时代翻译主客体关系的四重根本转型。

第一,从“单向加工”到“双向塑造”。传统翻译中,译者单向加工原文客体,客体不反作用于译者。AI 时代,译者通过设定约束(如术语规则、风格指南、字符限制、禁用词过滤)主动塑造客体生成方式,而客体的技术约束(如 UI 适配要求、实时对话上下文的演变)反向塑造译者的认知模式与操作流程,翻译不再是主体对客体的操作,而是组合内部的双向协商。

第二,从“一次性转换”到“迭代共生”。传统翻译以“定稿交付”为终点。AI 时代,每一次人工修改都被记录为对齐语料,回流至知识库,优化后续产出。客体(译文实例、修改记录、术语库条目)成为让组合“进化”的养料。组合不是静态的,而是在持续迭代中不断具体化,个体化。

第三,从“结果导向”到“过程驱动”。传统翻译关注“最终文”。AI 时代,过程性客体,如术语表、风格指南、对齐语料、评估报告,成为比最终译文更核心的资产。基于此,翻译项目前期的知识工程(术语提取、语料清洗、规则设定)占 60%的工作量和 80%的价值,后面的‘翻译’本身只是自动化流程。真正重要的是组合的“配置”能力,而非单次输出。

第四,从“语言对等”到“功能适配”。传统翻译的核心矛盾是“词句对应”。AI 时代核心矛盾转向“功能适配”,即让翻译客体在目标技术生态中实现预设功能。翻译是否正确,不仅由语言学标准判定,更取决于“在按钮宽度内完整显示”“点击后用户行为符合预期”“不触发敏感词过滤”“经过语用意图重构后完成交际目的”。这是翻译主客体关系从“语言领域”向“行为领域”的越界。

组合不是主体与客体的临时相遇,而是一个持续的个体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人与物相互发明,共同生成(Simondon, 2017:189)。在 AI 时代,翻译活动不是“人使用机器翻译文本”,而是“人—机组合在持续的不确定性协商中共同生成意义”。翻译的终极产品不是某一份译文,而是组合本身的个体化程度,即人机协同翻译能力的持续进化。

5 翻译与技术物的文化嵌入性(四柱)

5.1 西蒙顿论技术物的文化性

西蒙顿(Simondon, 2017:245-267)专门论述了技术物的文化嵌入性。他批评西方哲学传统将技术与文化对立起来。技术被视为冰冷、功利、无灵魂的,而文化被视为温暖、有价值、有灵魂的。西蒙顿认为这一对立是虚假的,技术物始终内嵌于特定的文化语境,其设计、功能、使用方式无不折射出特定社会的价值预设与权力结构。这一思想对知识翻译学的技术之维至关重要。翻译技术物不是中立的转换器,其训练数据的选择(哪些语言对、哪些语域、哪些文本类型)、算法架构的设计(如何建模语义、如何处理歧义)、评估指标的设定(BLEU 值偏好什么样的译文),无不嵌入特定的文化价值观。AI 翻译系统输出的每一个译文,都是“算法偏见+数据偏见+设计偏见”的复合产物。例如,张建丽等(2026:46)的研究表明,由于 ChatGPT 训练数据主要来源于英语语料,可能会导致模型的隐喻理解有一定偏向西方思维的趋势。

5.2 AI 翻译系统的文化偏见

AI 翻译系统的文化偏见,本质上是训练数据、算法设计与使用语境中隐含的价值倾向,在跨语言知识转换时的“折射”。首先是性别偏见。卡利斯坎等(Caliskan et al., 2017)的研究揭示,谷歌翻译(Google Translate)在处理土耳其语(无性别代词)到英语(有性别代词)的翻译时,表现出强烈的性别刻板印象——“o bir doktor”被译为“he is a doctor”,“o bir hemşire”被译为“she is a nurse”。这一偏见源自训练语料中医生与男性、护士与女性的共现统计倾向。AI 不是自主“学会”性别平等,而是放大了人类社会既有的偏见。

其次是价值观偏见。例如“维护国家安全”的翻译, AI 可能优先选英文语料中更高频的 safeguarding state interests(隐含“政权利益”偏向),而非更接近中文原意的 protecting national security;再如“人类命运共同体”,部分 AI 会译为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联合国官方译法),但也可能泛化为更西式的 global community 或偏离“共同”内核的表达。

再次是文化特定概念的扁平化。例如中国“龙”的多义性被 AI 简化为单一译法“dragon”,该词在西方文化中多为邪恶象征,偏离中国“龙”的吉祥、皇权内涵的丰富意涵。这不是技术局限,而是文化嵌入性的必然体现,由训练语料导致,中国“龙”的文化语义网络在跨语言对齐中被裁剪。

5.3 文化嵌入性的翻译学意义

知识翻译学技术之维的第四柱——技术物不是中立的,它内嵌着特定的文化语境、价值预设与权力结构,由此引出两个重要的翻译学议题:

第一,翻译技术物的“文化审计”。如果翻译技术物具有文化嵌入性,那么对其的评估就不能仅限于技术指标(BLEU 值、推理速度、成本),还必须包括文化审计,如系统的输出是否系统性偏向某一价值观?是否对特定文化概念进行扁平化处理?是否放大了性别、种族、宗教偏见?这要求翻译研究者与计算机科学家、伦理学家合作,建立翻译 AI 的文化评估框架。

第二,翻译技术物的“文化主权”。前文已提及,国家层面需发展自主可控的翻译 AI 系统,以防止他国价值观通过翻译技术物渗透。文化嵌入性揭示了这一诉求的合理性,不是民族主义的排外,而是对技术物非中立性的清醒认知。当一国公民依赖他国开发的 AI 翻译系统获取跨境信息时,他们的认知在不知不觉中被他国的数据偏见与价值预设所塑造。

技术之维的四柱为我们理解翻译与社会的深层互动提供了新视角。西蒙顿(Simondon, 2017: 273)认为,高度个体化的技术物进入社会后会发生“文化整合”,即从“陌生的、异质的、令人不安的”存在,逐渐变为“熟悉的、日常的、不可见的”基础设施。AI 翻译系统正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例证: TikTok 自动字幕、亚马逊商品描述自动翻译、Twitter 推文自动翻译,这些功能已嵌入社交、消费、政务平台的基础设施层,用户往往意识不到翻译的存在。这一“隐身”带来一个悖论: 翻译的调节功能越强,其调节行为越不可见。当用户不再意识到自己正在“通过翻译”接收信息时,对翻译过程中可能的信息失真、偏见植入、文化削弱的批判意识也随之消退。翻译从“文化谈判”退化为“技术自动化”,这正是西蒙顿警告的“技术物的异化”,也就是当技术物过于平滑地整合进日常生活,人类反而丧失了对其运作方式的反思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物文化嵌入性还可能导致没有自主翻译 AI 能力的国家的跨国信息流动被他国技术物中介。这意味着翻译能力从“软实力”升级为“数字硬权力”,即拥有先进翻译 AI 的国家,拥有在全球信息空间中定义、筛选、重构他者叙事的结构性权力。欧

盟斥资打造“欧洲语言平等”多语言 AI 系统,日本推动构建以日语为中心的翻译模型,中国推进“国家语言服务与人工智能平台”。这些国家战略印证了西蒙顿(Simondon, 2017)的洞见:技术物从来不只是技术物,它是权力的载体、主权的延伸、文化认同的技术装置。

6 结语

本文的核心论证是 AI 翻译带来的变化不是量级的,而是本体的。传统翻译研究要么将技术视为工具(技术工具论),要么将技术视为不可抗拒的宿命(技术决定论),二者共享一个预设,即技术外在于翻译本质,技术可以“应用”于翻译但不改变翻译的本体结构。西蒙顿的技术哲学打破了这一预设。技术物不是工具,而是具有独立存在模式的“存在者”;人与技术物的关系不是使用,而是“组合—调节”;技术物的进化遵循从抽象到具体的个体化逻辑。将这些思想纳入知识翻译学的“技术之维”,我们获得一个全新的理解框架:翻译从来都是技术性的, AI 只是将翻译的“技术性”推至极端。翻译不是“语言转换”这项“纯文化活动”加上“技术工具”,而是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媒介技术(从书写到印刷到数字网络)深度耦合。知识翻译学的“五梁十二柱”理论体系中,“技术之维”与“存在之维”“过程之维”“脉络之维”“价值之维”并列。研究表明,技术之维具有整合其他四个维度的潜力:技术物的个体化进程决定了翻译知识的生成方式;技术的文化嵌入性解释了不同文化传统中翻译实践的差异;翻译技术物的演变构成了翻译史的核心线索; AI 时代的翻译技术物引发可解释性、偏见、责任归属等全新伦理问题。技术之维不是五个维度中平行的一个,而是其他四个维度得以展开的“基础层”。

基于西蒙顿的技术哲学与知识翻译学的技术之维,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向深入:(1) 翻译技术物的个体化历史。从甲骨文到羊皮卷到印刷书到电子词典到神经机器翻译到通用人工智能,翻译媒介技术的演变如何塑造翻译主体的认知模式与知识生产方式?(2) 人机翻译组合的调节动力学。译者在什么条件下更倾向于采纳 AI 建议? AI 的“可解释性”如何影响译者的信任与决策?(3) 翻译不确定性的类型学与分配原则。哪些不确定性应交给 AI 处理(如词汇歧义)? 哪些不确定性必须保留给人类译者(如语用意图、文化特定概念)? 哪些不确定性应通过技术设计重新配置?(4) AI 翻译的文化审计。建立评估框架,系统检测主流翻译系统的性别偏见、种族偏见、价值观偏见与概念扁平化程度。

AI 时代的翻译研究,正站在范式转换的门槛上。本文以西蒙顿的技术哲学为理论基石,从知识翻译学技术之维的四柱出发,尝试勾勒这一新范式的轮廓。翻译学的未来不在于坚守“人文性”以对抗“技术性”,也不在于拥抱“技术决定论”以放弃人文关怀,而在于发展一种“技术—人文”共生的新知识形态,在深刻理解技术物个体化逻辑的基础上,重新定义翻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化实践之一,在 AI 时代“协商不确定性、重建意义”的不可替

代的使命。

参考文献:

- 胡作友, 窦金昌. 2026. 翻译学构建中的知识生产[J]. 外国语文(2):144-154.
- 杨枫. 2021. 知识翻译学宣言[J]. 当代外语研究(5):2.
- 杨枫. 2026. 种子与大地的约定——从“知识翻译学宣言”到“五梁十二柱”[J]. 当代外语研究(2):1-8.
- 张建丽, 王宇泽. 2025. 生成式人工智能机器人隐喻能力的实证研究[J]. 外国语文(3):41-51.
- Blofeld, J. (Trans.). 1965. *The Book of Changes: A new translation*[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Caliskan, A. , J. J. Bryson & A. Narayanan. 2017. Semantics Derived Automatically from Language Corpora Contain Human-like Biases[J]. *Science*, 356(6334):183-186.
- Legge, J. (Trans.). 1899. *The Yi King*[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Simondon, G. 2017.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M]. Minneapolis: Univocal Publishing.
- Wilhelm, R. (Trans.). 1950.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Ontological Reconstruction and Uncertainty Negotiation in AI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knowletology: A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Simondon'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PAN Yanyan WANG Jing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mode of the existence of translation.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either indulges in the anxiety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or adheres to the optimism of technological instrumentalism, rarely examining the paradigm revolution brought by AI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ntology of technical objects. Grounded in Gilbert Simondon's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tripl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ubject, object, and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of translation in the AI era. The analysis proceeds from the four pillars of the “technological dimension” of Transknowletology: the individuation of technical objects,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s of human-machine assemblages, the ontological status of uncertainty, and the cultural embeddedness of technology. The study finds that: (1) The translation subject is undergoing an individuation process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 forming a deeply coupled “combinatory-regula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translators and AI systems; (2) The object of translation expands from static texts to dynamic techno-ecological complexes, shifting quality standards from “faithfulness and equivalence” to “technical adaptation”; (3) Uncertainty is elevated from a predicament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to a core field where the subject manifests its value. The conclusion points toward a paradigm shift i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questioning “how to translate correctly” to exploring “how to reconstruct meaning within the uncertainty of human-machine negotiation”.

Key words: transknowletology; technological dimension; Simondon'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ontological reconstruction; uncertainty

责任编辑:陈宁